

延安文史

第一辑
1985.11.



蕉 岭 文 史

第 一 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蕉岭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室编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



数据加载失败，请稍后重试！

创刊词

蕉岭县政协主席钟海文

在县委的关怀和各界人士的努力帮助下，《蕉岭文史》资料第一期问世了。

蕉岭旧称石窟都，隶属程乡。明朝崇祯六年（公元一六三二年）才设县治（镇平），在漫长的岁月里，它哺育了无数仁人志士，优秀儿女，和留寓不少忧国忧民的谏官诤吏。有的是威名赫赫的卿相朝臣，他们“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的坚贞气节，披荆斩棘，图谋振兴中华，兴办教育，传播文化和爱国爱民的传统思想。近代的如林丹九、丘逢甲、罗福星、谢晋元、林修明等忠臣义士，他们都不愧为中华民族万古流芳的英模人物。

文史资料的整理出版，在政协工作中占有重要地位，它是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组成部分。政协组织拥有密集

的、多科学的、高水平的、经验丰富的人才，是综合性的人才库，只要我们充分发挥各民主党派、知识分子、科技人员、原工商业者和海内外的爱国人士提供的珍贵资料，编进史册，惠及后代，其作用将不可估量。

《蕉岭文史》的出版，正是旨在肩负这一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光荣使命。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总方针、任务指引下，文史工作要高举爱国主义旗帜，要存真，要实事求是，通过这份刊物，以达到启发人民、鼓舞人民，密切和增强我县各界人士与海内外侨胞的团结。

由于我们首次出版，难免有错漏之处，望读者批评指正。

《蕉岭文史》 目录（第1辑）

创刊词	县政协主席钟海文
邓颖超在全国政协第四次文史资料工作		
会议上的讲话	文史室摘录 (1)
蕉岭建制沿革	汤国云辑 (8)
蕉岭青年学生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		
革命浪潮	钟仁香供述、汤惕才执笔 (14)
明末抗清志士林丹九	冯志灵、林帆 (17)
林丹九答许有信书	县档案馆供稿 (19)
抗日英雄谢晋元	谢雪霞供稿虞宝棠整理 (21)
回忆我的丈夫谢晋元	凌维诚 (32)
黄涛将军传略	黄曼供稿文史室整理 (36)
国际青年数学家丘成桐	汤国云 (46)
吴公辅献身桑梓教育事业概述	
	赖士官、黄碧池供稿 汤惕才整理 (51)	
陈庭凤与蕉岭教案	赖雨桐 (54)
历代我县举人、进士名人简辑	汤汤辑 (60)
征稿启事	文史室 (65)
编后话	编者

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同志 在全国政协第四次全国文史 资料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摘录)

我们政协的工作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活动性的工作。根据我们政协机构的性质包括参加政协的单位，包括政协的几个委员会和十几个工作组，要进行协商，要开会，要讨论，要做决定。这些方面的工作是大量的。我觉得政协还有另一方面的工作，就是静的工作。文史资料工作就属于这一类。它跟其它方面的工作方式、方法上不完全相同，他需要坐在那个地方，动脑子，看东西，思考、研究。所以，从形式上，从工作内容上看，我觉得这个工作是属于静的工作，当然，这也是相对而言的。但是从其效果看，它又可以发展成为活动性的工作，扩大我们的活动领域，甚至连政协各个组的工作都可以包括到它里头去。它可以扩大统一战线的对象和统一战线的影响，发挥我们对人民，对青年进行爱国主义、共产主义思想教育的作用。这两个方面的工作看起来是一动一静，截然不同，但又不可截然分开。因此，我们

说这两部分工作，都是政协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什么说静的工作又可以转变成为活动性的工作呢？我们不去讲征集的时候要活动，就以扩大统一战线的联络面来说吧，文史资料工作是能够在这方面充分发挥作用的。

在《广东试向港澳和海外征集史料的情况和反映》这个材料中举到两个例子：一是罗翼群、一是郭典三，我们文史资料登了他们的材料，他们的后代、亲属看到后，很受感动，声称，只要祖国需要，一定回来，并且表示今后要为促使台湾回归祖国为“四化”多作贡献，发扬祖辈的优良传统。通过文史资料的征集出版，使另外一些人缩小了同我们的距离，有的甚至考虑回国定居。这不是把静的工作又变为动的工作了吗？所以我们对文史资料工作不仅要重视它，而且要像刚才杨成武副主席说的那样来进行。他的发言，我都拥护。我只补充一点，我们文史资料工作是要埋头伏案在那儿编辑，然后付印出版，看起来好像是单纯的文字工作，其实不然，因为我们的资料拿出去以后，马上就起到活的作用。这个文字工作就跟我们统一战线的其他活动性工作一样，是一种不可缺少的工作形式。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就看到了文史资料工作的作用和影响。再说一点，就是今后要注意提高文史资料的质量。要广征精选，对收到的一些材料，不要因不符合我们的观点，不符合我们现在的目标，不符合我们原来的

原则就轻视它。只有实行广征精选，文史资料出版的质量才能提高，它的作用也才能随之而扩大。

会议的一个收获就是以后我们在编辑文史资料的时候，审查征集来的稿子的时候，有了明确的目标，就是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就是要看我们征集出版的资料对于爱国主义，对于我们国家，对于人民，对于后代是不是有利？有了明确的目标，在选择资料方面就容易统一思想，分歧也可以解决。不过，我们光明确目标还不行，还要确认求实的精神，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就是要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看人、看事。

我看有这么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就是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收到各方面的材料怎么处理？是多少登多少，来什么登什么，还是应当定出一个适应的办法？我看，这个问题现在已经得到了比较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征集、处理党政军民各方面的资料要有分工、有协作。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主要是征集出版近现代史资料，属于党史和党的军事史材料如果送来了，可根据分工协作的精神，将一些稿子交给有关单位去处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公开发表还是内部发表，也应有个区别。有些比较长的，有份量的资料，可以作为专题出单行本。

在这里，我要提个问题，就是说我们高举爱国主义旗

帜，那么，写卖国贼、反动派的材料我们还要不要征集？要不要出版？我请同志们研究，首先请全国政协的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来研究。我个人的意见，我们教育人民，光有正面的材料还不够，还需要有反面的材料。我们光说某某卖国了，我们要爱国，某某是反革命，我们要革命，这是很不够的，还必须把事实的材料拿出来。比如袁世凯，是怎么卖国的？西太后垂帘听政，可以不可以写？我觉得可以写。写那些呢？写她卖国啊，投降啊，对帝国主义屈膝啊，这样人民才会懂得，我们要爱什么样的国家，国家要由什么样的人来掌权。反面教材可以使我们知道为什么要反，为什么要爱？我觉得我们文史资料可以收集编辑一些反面的材料、敌人的材料。

我们搞近代史料、现代史料，这非常好，可以由近及远，现在我们许多青年，包括中年对五、六十年前的事情都不甚清楚，不甚了解。《人民日报》有个专栏，叫做“学点民国史”，我觉得民国以来的历史确实是值得写的，应该让我们活着的老人和中年人都知道一下。如“四大家族”的材料我看了，对我是一次很好的学习，过去我光知道“四大家族”他们是官僚资本，压迫人民、剥削人民，我们要打倒它。但是，它是怎样发家的我不知道，看了以后才知道他们要尽各种手段，把国家财富的百分之七八十都搜括到他们四家手里，对其他的他们还有控制权，整个国家的经济命脉掌握在

他们手里，所以要打倒啊！我要给你们讲个非常简单，也值得引起我们极大深思的事情，就是周恩来同志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作过黄埔军校政活部主任，这件事情他的侄儿侄女都不知道。“文革”中人家提出来了，他们来问我，这下对我们敲了警钟，这是因为我们对他们缺少历史的教育。一方面固然事情忙，另方面好像还用不着告诉他们。那晓得告诉晚了，糟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跨党分子，毫不奇怪，但那些年轻的红卫兵就不理解，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第二次国共合作，我们有些秘密共产党员被安排在国民党机关，后来国民党实行独裁，实行法西斯专政，对于主张抗日、对于主张团结、主张进步的分子，稍为看出点苗头的就要抓人。这些人的确不是他们的人，是我们没有公开的共产党员和左派，是我们党派到国民党的机关去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是为了抗战救国，不是什么挖国民党的墙脚。“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反共，这些同志不能再在国民党统治区呆下去了，我们只好把这些人疏散撤退。解放以后，这些人到了我们一些机关工作，在我们妇联的较多，结果在“文革”中这些人就挨整得厉害，甚至于说，妇联变成了国民党特务机关，把我们党领导下的公开的全国妇女联合会竟说成这样！过去在国民党机关是隐藏有秘密共产党员的，“文革”中，红卫兵不分青红皂白，也不跟过去的历史

联系起来，所以就搞错了一些人，最大的案件是新疆的案子，你们听说了。盛世才拘捕了一大批共产党员，也包括无党派爱国人士，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些人都被打成了“叛徒”。实际呢，是中国共产党经过周恩来与张治中这个老朋友交涉，要他把这部分人释放。当时张治中在新疆，是蒋介石派他去解决新疆问题的。他办了这件事，把这些人放了，都送回延安了。建国以后，这些同志撒在各个部门。“文革”中红卫兵追问历史，噢，你是在新疆被捕过的，那都是叛徒。这个问题可费了大劲呢，我们的同志为这事挨整的不少。有的受了很大的委屈、有的人得到保护就好一些。我举这两个例子，是想说明我们不仅要“抢救”健在的老一辈的历史，就是从民国成立以来孙中山怎样当总统，他的总统为什么当不长？军阀怎么割据、混战，这些材料，恐怕对我们中、青年都是很有现实教育意义的，我建议是不是在近现代史中再划一下，划出一个民国史。

我愿与同志们一同努力，今后对文史资料要尽量地翻一翻，不能象过去那样，是会外人，旁观者，可看可不看，没有时间就不看。我希望，凡在政协的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层人员，对于文史资料应当比过去更为重视，过去有些同志认为文史资料是出给别人看的，自己没时间就可以不看。这种态度现在看来不行了，应当改一改。我虽然这样说了，但

究竟能看多少也很难向同志们作出什么保证，不过我很愿意在这方面跟同志们共同努力，把工作做好。

蕉岭县建制沿革

湯国云辑

我县位居广东省之东北，韩江流域的上游。地形狭长，面积九百七十八平方公里，纵横约一百二十余里，人口约二十万。群山环纵，溪流众多，山清水秀，层峦耸翠，人文蔚起，物阜丰藏。气候宜人，水陆交通方便，是闽粤赣边区重镇。

一、县的隶属沿革

蕉岭原名石窟，原为程乡县之辖地。程乡县属敬州（即今之梅县）。

远在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纪年前214年）平南越郡，当时镇平属南海。

汉朝，镇平属揭阳县（今潮安）。

晋置东官郡，又置义安郡。义安所属海阳县，即汉揭阳之地。

南北朝、宋、齐时。（公元480——500年间）萧齐始设置程乡县。齐义安郡，领绥定、海宁、海阳、义招、潮阳、程

乡六县。以当时乡人程旻姓名县，程乡即由此而得名。

隋平陈，置潮州，程乡又属潮州。

五代南汉时，改程乡为敬州。

宋开宝四年（971），改敬州为梅州，这之前为避讳，梅州又称为恭州。

元时梅州改为敬州，俟州县合一时代，程乡县分为怀仁（是石窟）、光德、丰顺、逢福、万安及大平共六个乡名。

明洪武二年（1369），废敬州，将程乡乡县再隶属了潮州府。明正德年间（1506——1521）粤之兴宁、程乡、闽之武平三县，皆为盗窟，贼李四仔者甚至潜称王，时议欲三县接壤之地置州，以塞盗源。局程弘欲城石窟，大柘与兴宁民欲城礼福湾，武平民欲城千户所；当道以人言喋喋，恐生衅端，事遂寝。

崇祯元年（1628），五总贼啸聚数千人，在粤赣边区肆虐，结寨称王，经闽粤两省官兵会剿，至崇祯五年（1632）九月，始告叛平。

在此期间，潮州兵道谢连，曾申请有司设镇平县，以根绝盗患。

崇祯五年（1632年）二月，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两广军务兼巡抚广东熊文灿、搜讨闽海盗无功，诏贬秩戴罪自赎，因奏设连平、镇平。乡贤赖其肖请开筑镇平县城

池呈稿：“石窟背山面水，形势清奇，“田赋坦平渊沃，江通舟楫，民免负戴之劳。金汤险阻，临敌可作坚城。”移巡司以通驿运，“东或请益于松源，南或求裨龟浆。”地势上，“总握三省咽喉，独当一锁钥。”论述了蕉岭之地理形势，是闽粤赣三省军事交通上的重要位置。熊文灿采纳呈文，奏请朝庭，于明崇祯六年（1633）割平远石窟都，程乡之松源、龟浆二都，建镇平县，隶属潮州。

清雍正十一年（1733），程乡升级为嘉应州，以潮州府属之平远县，镇平县及惠州府属之兴宁县、长乐县合并为嘉应五属。

清嘉庆十二年（1807），大吏奏升嘉应州为嘉应府；十七年（1812）仍改为州，是嘉应州镇平县。

民国元年，废清潮州府之治，将原嘉应州改为梅县与平远、镇平、兴宁、长乐五县平行。

民国三年（1914），镇平县改名蕉岭县。

一九五二年春，蕉岭与平远合并，称为蕉岭县，府治设蕉城镇。

一九五四年春，蕉岭、平远又分县，仍称蕉岭县。

一九五九年蕉岭与梅县合并，称梅县。一九六一年四月，蕉梅分县，恢复原蕉岭县建制。

二、县名的由来

镇平，镇压升平之意。据邑志载：清顺治三年，涂爪王、钟胜山等山寇作乱程乡石窟平远，后卒势败受降。至十六年，武平贼赖国康，镇平贼徐黄毛，程乡贼吉洪，窜扰三省边境，官员进剿屡败，历年余始平。康熙十二年，土寇披猖、攻镇平县城不逞，十四年二月，海寇侵踞县城，十六年始行修复。镇平县之得名，盖以继叛平土寇后，恢复县政，用示镇压升平之意也。

民国后改名蕉岭。因广东镇平设县后，在我国版图上出现了两个镇平县。一在河南省，汉置县，初名涅阳。隋改曰课阳，金末改为镇平；明、清皆属南阳府。一在广东省，为时县治免于雷同，因河南镇平在先，便改广东镇平县为蕉岭，“城跨蕉岭之上，县以岭名。”

蕉岭又名桂岭。郝通志：桂岭在城内北隅，旧名蕉岭。县城高跨其上，有万寿宫，名镇山楼。全通志所谓仁寿在城内北岭，明崇祯间建者，即此邑。城建于桂岭之阳，即古怀仁里，所谓石窟蕉岭也。所以县治所在地即名蕉阳，今为蕉城镇。

附：现县乡（区、乡名称）一览表

蕉岭原称十二个乡，两个镇，即：兴福乡、招福乡、同福乡、文福乡、广福乡、白马乡、金丰乡、金沙乡、徐溪乡、